

論謝肇淛《五雜俎·地部》的地景書寫

李燕欣*

摘要

本文取用文化地理學中地景此一概念，研究謝肇淛《五雜俎·地部》文本，以「文化記憶的召喚與重塑」和「山水的遊觀與再現」為觀察面向，探討作者寫作《五雜俎·地部》的意義，前者得出作者會藉由實地考察地景而對舊有的文化記憶作出驗證，並透過地景歷史的回顧和個人的親身經歷，形塑出新的文化記憶，繼而提出有關地景運用的評判。後者得出作者在遊觀山水時，重視個體的精神收穫，而對於園景的築設此一再現山水的形式，他既有表達對當時富人、俗士造園目的和審美能力的否定，也有在遊園的過程中興起關於生命的消亡與物質的存有的感悟。

關鍵詞：謝肇淛、五雜俎、地景、文化記憶、山水

* 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

一、前言

明代特別是晚明的旅遊活動極盛，而旅遊風氣的普及使得此時期出現多元複雜的旅遊論述。¹今人注意到明代的地景書寫與前代不同，周振鶴指出當時以徐霞客（1587—1641）《遊記》與王士性（1547—1598）《廣志繹》為代表的各種遊記、地理志或與旅遊相關的論著，「它們突破了過去地方誌式的對各地位置、幅員、山川、人口、風俗等內容的簡單的、分類式的記載，將作者對自然界與人文社會的縝密觀察作如實的描寫」，²這道出明代「筆記體」文本可以兼容地理、事跡、風土、人情和記憶等各種書寫內涵的文類特點。³而除了徐、王二人外，謝肇淛（1567—1624）同在書寫地理時關注於人文事跡和風俗，其編纂《滇略》、《萬曆福州府志》、《萬曆永福縣志》、《鼓山志》、《方廣巖志》、《支提山志》和《太姥山志》等志書，⁴以及創作收入《小草齋文集》⁵的多篇遊記與《百粵風土記》，其中既有客觀的地理記錄，也有主觀的風土觀察。另外，謝肇淛有《五雜俎》一書，其中〈地部〉二卷以條列的形式記述了作者的旅遊經歷，現時的《五雜俎》研究多把〈地部〉文本視為史料，⁶而一些關於明代遊記文學的研究也只選取零星的

¹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225。

²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頁72-78。

³ 范宜如有詳細析論筆記此一文體的書寫型態及文化意涵，見氏撰：〈謝肇淛《五雜俎》中的物質與地域視野〉，《中正漢學研究》第2期（2013年12月），頁177-181。

⁴ 關於謝肇淛的史部著作及內容概要，可參吳智和：〈謝肇淛的史學〉，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頁23-49。

⁵ 《小草齋文集》收有36篇遊記，詳見謝肇淛撰；江中柱點校：《小草齋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50-222。

⁶ 如陳磊論文提到〈地部〉中有關當時各地自然資源如岩石、石油和溫泉，氣候和生態的變遷，自然災難如水災、火災和地震，以及社會環境與官方政策等記載。車海童論文有說明：「《地部》記錄了一些地理知識，包括山川、河流、湖泊、山脈、邊防、海防、以及當地一些風土人情和經濟社會等生活狀況的內容，尤其是對京師地理位置描述，通過歷代的不同記載，對其都城選址進行了分析。」但全文只有兩處引及〈地部〉文句，用以說明《五雜俎》的版本問題。鄭娟娟論文引及〈地部〉有關城市、軍事邊防、互市等論述。衡大新論文只引及〈地部〉中關於閩中的論述。蔡景康論文引及〈地部〉文句說明謝肇淛的文學觀，和他對人民生活的記錄。他們都把〈地部〉文本視為史料，而沒有看出其中文句之間的聯繫，劉海燕甚至認為：「像《五雜俎》這類筆記，往往各自分條論則，前後雖然是雜記同類事物，但各不相屬，所以在其中刪去一二則，並不礙於行文，所以這種多一則少一則的問題也甚少有人注意。」見陳磊：《〈五雜俎〉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王玉德先生指導，2011年5月），頁21-28，30，36，39，41，45-46，50；車海童：《謝肇淛與〈五雜俎〉》（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閻崇東先生指導，2012年5月），頁14，17-18；鄭娟娟：《晚明遊記的史料價值》（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樓毅生、鮑永軍先生指導，2007年5月），頁26-28，30，32，44；衡大新：〈謝肇淛《五雜俎》中閩中風土人情書寫〉，《閩臺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頁95-100；蔡景康：《〈五雜俎〉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2期，頁102；劉海燕：〈謝肇淛筆記三種考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地部〉文句以說明當時文人的旅遊觀念，⁷研究者都沒有看出〈地部〉中各條文句之間的關聯，以及其中可以深入分析的空間。如謝肇淛在多條文句中書寫同一地景，這些句子可以整合起來，完整地見出他對該地景的觀感，和他由書寫該地景表達出的對當地的文化和歷史的看法。謝肇淛在〈地部〉敘寫地景的同時，對當地的人文風情作出探研，並且注意到地景背後的歷史內涵，進行古今地理形勢與人民生活情態的比較，最後作出批評或表達感悟。此種對地景的思考與描寫進路使得內容龐雜的〈地部〉文本能夠有較為集中的探討方向，本文即聚焦於謝肇淛《五雜俎·地部》，試圖由「文化記憶的召喚與重塑」與「山水的遊觀與再現」兩方面研究其「地景書寫」。

謝肇淛在《五雜俎·地部》描寫了歸屬於自然地理、山水風土與園林景觀的事物，本文以「地景書寫」定義《五雜俎·地部》的文本，乃取地景（landscape）在文化地理學中的意涵，Carl Sauer 指出地景一詞可定義為由自然和文化所共構的「大地形態」（land shape），⁸Mike Crang 也表示：「地景首先暗含了自古至今對大地的集體塑造。地景並非個人資產；地景反映了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地景就像文化一樣，反映出這些元素的匯集，因為文化也不是個體的資產，而且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⁹又有以「地景是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為喻，解釋地景與文化的緊密關係：

刮除重寫一詞衍生自中世紀的書寫材料。這指涉的是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如此不斷反覆。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清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合。因此，我們可以用這個觀念來類比銘刻於特定區域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體。¹⁰

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頁100。

⁷ 如王雨翌論文只有兩處引及〈地部〉文本，田文萍論文只有一處引及〈地部〉文本，張明琛論文有三處引及〈地部〉文本，詳見王雨翌：《晚明遊記文學研究》（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徐永明先生指導，2013年5月），頁25，75；田文萍：《晚明士人旅遊活動研究——以遊記為例》（四川師範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鄧前程先生指導，2011年3月），頁20；張明琛：《晚明閩籍作家旅遊與遊記研究》（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陳慶元先生指導，2016年12月），頁122，209，234。從上可見即使研究者認知到〈地部〉中有關於地景遊觀的論述，也沒有給予重視。

⁸ 「大地形態」一詞出自〔英〕艾倫·貝克（Alan R. H. Baker）著，闕維民譯：《地理學與歷史學——跨越楚河漢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111。Carl O. Sauer 原文收入 John Leighly (ed.),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 321.

⁹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頁18。

¹⁰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27-28。

說明了地景作為「文化的記憶庫」。¹¹而「地景書寫」的作者透過自然與人文的敘寫，形成兩重「文本」，¹²這正是《五雜俎·地部》所反映的書寫意蘊。

至於選擇從「文化記憶的召喚與重塑」與「山水的遊觀與再現」此兩方面研究謝肇淛的「地景書寫」，關於前者，由於本文欲探討的是涵有文化意義的地景，而地景的肯認又是以觀察者的存在為前提，Tim Cresswell 說明其中一個地景有別於其他空間概念的地方是：「地景結合了局部陸地的有形地勢（可以觀看的事物）和視野觀念（觀看的方式）。地景是個強烈的視覺觀念。在大部分地景定義中，觀者位居地景之外。」¹³而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研究則是強調記憶者的存在，以探討記憶者如何回憶具有文化意義的事物，並對那些已有的記憶作出更新，召喚與重塑記憶又是以觀察或面對事物為基礎。¹⁴因此，本文第一部分

¹¹ [英]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 28。

¹² 許凱鈞指出景觀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構建」：「簡單來說，景觀不只是人類所看見的世界，還是世界的再建造，再組織，是觀看世界的一種方式。於此不妨耙梳一下至此的論述，景觀大致具備幾個層次，首先，應當留意景觀現象，乃係自然與人文相互作用而成的『文本』。其次，景觀現象之所以能呈現，前提為自然必須先能進入人類的心靈，才能為人所參與改造。之後才有區域中的人在裡頭棲居，進而建立其生活世界的秩序，此為第一重景觀文本。而地理學家、詩人、畫家感知到景觀進入心靈，結合既有意識型態與私我的想像後，進行詮釋產生了第二重景觀文本。」案：上文的景觀意同地景（landscape），見氏撰：〈《水滸傳》梁山泊文化景觀析論〉，《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8 期（2010 年 10 月），頁 84-85。

¹³ [英]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頁 19-20。

¹⁴ 在現時學界有關於「文化記憶」的研究中，學者多藉由詮解德國歷史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的文化記憶理論，得出文本探討的面向和細節。如陳玉箴在研究 1960-1980 年代臺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時有以其理論為分析工具，並對之作詳細的論述。阿斯曼在其著作中闡述了文化記憶理論，如指出記憶者過去的記憶是經過重組的（Anyone who during today fixes his eyes on tomorrow must preserve yesterday from oblivion by grasping it through memory. This is how the past is reconstructed, and this is the sense in which we can say that the past comes into being when we refer to it.），文化記憶必要依附於物質上（Cultural memory, then, focuses on fixed points in the past, but again it is unable to preserve the past as it was. This tends to be condensed into symbolic figures to which memory attaches itself – for example, tales of the patriarchs, the Exodus, wandering in the desert, conquest of the Promised Land, exile – and that are celebrated in festivals and are used to explain current situations.）和文化記憶不是真實的（What counts for cultural memory is not factual but remembered history.）等，根據筆者對阿斯曼文化記憶理論的整理和參考應用文化記憶理論的學者對阿斯曼理論的解讀，得出阿斯曼文化記憶理論的應用條件：記憶者的文化記憶乃由物質喚起，而文化記憶的存在涉及「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時空範圍，「現在」是一個社會空間，與「過去」和「未來」共通，因此在文化記憶中不存在歷史真相，文化記憶是處於不斷更新的狀態。至於文化記憶的內容，可以是關於宗教、藝術、歷史或地景，記憶者對文化記憶的內容進行重構而非記錄的工作，再藉由載體傳承給後代。重構文化記憶是一個回顧傳統，與記憶互動，以及依靠自身的知識和經歷創造記憶的過程。其中，記憶的作用包括作為記憶者通往過去的管道、使記憶者產生身份認同與對記憶者思想產生約束能力。本文基於以上對阿斯曼文化記憶理論的理解，和由今人如范宜如、衣若芬和林韻柔等學者的論文見出以文化記憶理論探討地景書寫的可行性，而把阿斯曼文化記憶理論應用於探討謝肇淛《五雜俎·地部》的地景書寫。詳見陳玉箴：〈1960-1980 年代臺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臺灣文學學報》第 25 期（2014 年 12 月），頁 40-44；范宜如：〈地景·光影·文化記憶：論王士性紀遊書寫中的江南敘述〉，《東華中文學報》第 3 期（2009 年 12 月），頁 145-169；衣若芬：〈瀟湘八景—地方經驗·文化記憶·無何有之鄉〉，《東華人文學報》第 9 期（2006 年 7 月），頁 111-134；林韻

意欲研究身為觀察者／記憶者的謝肇淛如何面對、書寫地景／具有文化意義的景物。關於後者，謝肇淛在文中既有抒寫自己遊觀山水的經驗，也有論及人工園林的構築，而由於地景研究的內涵包括了對自然環境、園林設計和景觀詩畫等事物的探討，¹⁵所以本文意欲把《五雜俎·地部》的山水與園林論述納入「地景書寫」的討論範圍，在第二部分接續關注於謝肇淛如何看待山水的遊觀與園林的構築，和在人工景物中提取哲理，引發生命的感悟。

二、文化記憶的召喚與重塑

地景是「人經由觀看、詮釋、營造等過程定義並介入土地的『文化』角色」，在其中的人對之保持著觀察與批評的距離，作出認知與感知的活動。¹⁶從觀察者的角度，地景是其文化記憶的載體，而文化記憶本身又是古人集體智慧的累積與其個人生命經歷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因記憶者的需求而被修改與添加。¹⁷因此，當觀察者把當下的記憶具體化為文本，其中的地景論述便是作者文化記憶的重塑成果。謝肇淛在《五雜俎·地部》召喚自身本有的文化記憶，再根據實地的考察，試圖還原地景的真貌，如其記：「《洞天福地記》所言里數多誕，如云泰山周回三千里，霍林洞天亦三千里之類。今計其地，才百分之一耳。或以列真所居分治之域論耶？其說殆不可曉。」¹⁸也有引及《紺珠集》對東南、西北的天地、水土、生物、人民、飲食與土風的批評，經過對現今情況的探察，確認記憶：「此數語足盡南北之風氣，至今大略不甚異也，但南方土風近稍獐悍耳。」¹⁹又有寫：

三國時諺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蓋當時形勝，自是建業為上游，而文物之繁麗，沃野之富饒，又所不論也。鐘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諸葛武侯已稱之矣。但孫氏及晉，不過百年，宋、齊、梁、陳，為祚愈促。我太祖定鼎創業，將垂萬

柔：〈凝視與再現：天台山記中的宗教文化記憶與行旅書寫〉，《東華漢學》第27期（2018年6月），頁125-161。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7,37,38.

¹⁵ 〔西班牙〕樂墨（Antonio Mezcua López）：〈宋代山水文化：一個和諧理念的成就與對立〉，《哲學與文化》第39卷11期（2012年11月），頁116。

¹⁶ 譯文引自康旻杰：〈地景敘事的詮釋與建構：臺北社子島文化地景的實驗性敘事操作〉，《地理學報》第86期（2017年9月），頁51。原文見D.W. Meinig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

¹⁷ 衣若芬：〈瀟湘八景—地方經驗·文化記憶·無何有之鄉〉，《東華人文學報》第9期，頁119。

¹⁸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545。

¹⁹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21。

祀，而再世之後，竟復北遷，豈王氣之有限耶？抑終是偏安之勢，非一統之規也？²⁰

謝肇淛因為思考明太祖遷都的用意而回憶古人居於建業的感受，想起三國時期的諺語，三國時期的諺語作為前人承傳下來的文化記憶，保存了他們對當時建業的觀感，為謝肇淛繪出此一地景的人文印象。而作者在召喚記憶時，注意到過去累積的文化記憶的時效性，於是以現今觀照當時，其對建業的記憶重塑非獨憑前人所言，而是透過回顧建業作為「帝王之都」的歷史事實，以完成文化記憶的形構，再由南朝國祚的短暫，得出明太祖北遷乃因建業「王氣之有限」或「終是偏安之勢」此二理由。

謝肇淛在書寫地景時由親眼所見、親身所歷而對前人的詩文、論著、傳說與諺語等文化記憶進行辨識的行為，反映出其在實地考察前是帶著預設的記憶想像地景的真實面貌，在博雜、零散的筆記文本中，由於作者在金陵是以居留者的身份生活，因此對金陵有較為切身的敘述，其寫：

金陵鐘山，百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鬱鬱蔥蔥，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氣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樓，東北望無不見鐘山者，其他四遠諸山，重沓環抱，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內繞，則無復出氣，不成都矣。²¹

他依從劉禹錫、高季迪的詩句所提供的視角觀察金陵，而由文中的「望」的舉動，能夠感受到作者的在場。但是，謝肇淛畢竟是外來者，所以在遊覽地景時會抱持著「吾閩中」、²²「吾閩」²³的鄉邦意識，以閩中作為參照點，²⁴用本有的閩中記

²⁰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25-1526。

²¹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26。

²² 如：「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質白理，高逾尋丈，峰巒窟穴，剩有天然之致，不脛而走四方，其價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此物。而吾閩中尤艱得之，蓋阻於山嶺，非海運不能致耳」、「溫泉，江北惟驪山、沂州有之，江南黃山、招州有之。至吾閩中則多矣」、「燕、齊蕭條，秦、晉近邊，吳、越狡獪，百粵瘴癘，江右蠲瘠，荆、楚慄悍，惟有金陵、東甌及吾閩中尚稱樂土」，見〔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16-1571。

²³ 如：「吾閩玉華洞石似昆山而精瑩過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許」、「吾閩四山皆瀑也」、「天下之橋以吾閩之洛陽橋為最，蓋跨海為之，似非人力」、「吾閩俗謂延平之水高與鼓山平，然未有以試也」、「倭自嘉靖末，鈔掠浙、直、閩、廣，所屠戮不可勝數，既以吾閩論之，其陷興化、福清、寧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化尤甚，幾於洗城矣」、「吾閩城內外諸山皆有之，但無好事者搜剔之耳」，見〔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16-1571。

²⁴ 范宜如稱謝肇淛：「有意思的是，無論旅遊各地，他總有一個丈量的標準。在〈遊西湖四記〉言：『迹石屋無甚奇，覽勝不及孤山，而秀拔劣於龍井，第吳越中罕見之故，浪詫為

憶建構對金陵的認知，如道：「金陵規模稍狹，鐘山太逼，而長江又太逼，前無餘地，覺無綿遠氣象，其大略仿佛甚似閩中，但閩又較偏一隅耳。」²⁵又有言：「金陵以三吳為東門，楚、蜀為西戶，閩中以吳、越為北門，嶺表為南府。至於阻險自固，金陵則藉水，閩中則藉山。若夫干戈擾攘之際，金陵為必爭之地，閩可畢世不被兵也。」²⁶而因為長時間宦遊當地，而非作為來去匆匆的過客，所以謝肇淛可從日常的生活經驗中了解金陵，文中寫：

余承乏留都比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獨在太平門外，左鐘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二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緩轡徐行，晨入酉出，嘯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職方，徙北水部，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追思曩者閑心樂地，詎可復得？故今宦者謂留都為仙吏，而留都諸曹中，司寇之屬尤為神仙也，然不可為巧宦者道也。²⁷

在金陵逗留的時間裡，其所深刻記憶的並非金陵的名勝，而是在四季的風光中、在尋常日子裡「緩轡徐行，晨入酉出，嘯歌自足」的光影。謝肇淛還會微觀金陵的事物，如留心於當地景點的石頭：

「雨花臺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狀如鞞鞞，青碧紅綠不等，亦有極透明可愛者，不減寶石也。雨後行人往往拾得之。豈當時天所雨花，其精氣凝而為石耶？」²⁸

「金陵鳳凰臺上有奇石，丈許，相傳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鳳凰臺〉詩於上，蓋亦宋人墨跡也。楚陳玉叔官金陵，舁以歸，舟至採石，大風浪作，舟竟覆，石沉焉。豈謫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

奇，置之吾閩，不過培塿耳。」這個準則，就是以閩地山水為其指標意義。這種比較或對照也許是一種鄉邦意識，但此種爭競心態卻也意味了『地方』書寫的感性特徵以及不可避免的家鄉中心論。」又毛文芳指出：「旅行書除了紀錄旅遊的經驗表象，更重要的是建構作者的『自我主體』與『他者』之間的對話交鋒，旅行者離家在外，跨入『他者』的地理和文化版圖，……純粹由歸零開始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因為旅行的主體永遠帶著先在視野（包括原先文化、語言結構、意識型態）。」而「所謂『先在視野』是指對過去傳統的理解與詮釋，透過歷史的傳遞建立起自己認知與存在的世界」，謝肇淛正是以閩中為「先在視野」以觀察「他者」金陵。見范宜如：〈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燿、徐（火勃）為考察對象〉，《國文學報》第59期（2016年6月），頁20；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3期（2000年9月），頁1-2，7。

²⁵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26。

²⁶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26。

²⁷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27。

²⁸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27。

異矣。」²⁹

雨花臺的石子不是永久保存於景點的事物，其記憶的價值體現於行人的拾取行為；鳳凰臺的奇石先有傳說依附，後有宋人刻詩於其上，使之成為文化記憶的載體，而即使此石沉江，不復存在，又有作者承繼前人而續寫想像。綜觀之，在人、地的互動中，金陵那些隱於生活細節中的片段，和已無法復見的事物，都因地景的存在而成為可得承續、傳世的文化記憶。

謝肇淛對金陵的遊觀沒有停留在表面，而是透過現實的地景回憶此地的歷史，其寫：

太祖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伎，曰來賓，曰重譯，曰清江，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煙，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蓋當時縉紳通得用官伎，如宋時事，不惟見盛時文罔之疏，亦足見升平歡樂之象。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王百穀送王元美詩云：「最是傷心桃葉渡，春來聞說雀堪羅。」語雖不典，然實關於國家興衰之兆，非浪語也。³⁰

人民與地景的關係錯綜複雜、互相作用，³¹他們既是由地景得到文化記憶，同時又是地景的文化記憶的提供者，謝肇淛沒有詳細刻畫金陵十六樓，而是敘述十六樓乃供官伎所居此一用途，並以之為太祖時「升平歡樂之象」的顯證。官伎擔當著連接今昔的金陵的角色，她們是金陵往日繁華的象徵，作者通過官伎探得地景背後的人文痕跡，又寫：

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六朝以盤樂亡，而東漢以節義、宋人以理學，亦卒歸於亡耳。但使國家承平，管弦之聲不絕，亦足妝點太平，良勝悲苦呻吟之聲也。³²

²⁹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29-1530。

³⁰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27-1528。

³¹ 林淑慧：「地景（landscape）不只是一群自然現象的組合，而是人與自然之間錯綜複雜相互作用的呈現。」見氏撰：《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臺北：萬卷樓，2014年），頁 192。

³²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28。

人民的流動所形成的生活氛圍則是構成了地景的非物質成分，³³謝肇淛注意到金陵的文化記憶蘊有自六朝以來由此地的繁華所積聚而成的歷史深度，與日夜活躍於其間的官伎使得此地所擁有的時空厚度。由此可見，不同時代的人民的生活面貌成為了文化記憶的內涵。作者有記：

金陵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為廛肆，此亦必然之勢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後，餘地自多，弈世承平，戶口數倍，豈能於屋上架屋，必蠶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愛此無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近來一二為政者苦欲復當時之故基，民居官署概欲拆毀，使流離載道，瓦礫極目，不祥之兆莫大焉。³⁴

街道豐富了地景內在的人文脈絡，而兵火之時與升平之世，由街道形成的表象又會不同，這是權力施於地景的作用，所以此種地景內部的改變是被動的。由謝肇淛對官府的批評，反映出他在實地考察後所為並非止於對舊有文化記憶的修正，而是試圖積極地表達對當時政事的不滿。這種探研地景的目的在《五雜俎·地部》中論及古今君主建都的歷史時，更為明顯。文中寫：

帝王建都，其大勢在據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則在鎮遏戎狄，使聲息相近，動不得逞。關中逼近西戎，故唐時回紇、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橋。漢時灞上細柳連營，天子至親勞軍，蓋當時西虜似強於北也。至宋時，幽、燕十六州已為契丹所據，則自河南入江淮，其勢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鎮之。使當時從晉王言，都關中，則畫淮為界，不至紹興而始見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勢不得不阻江為固，鎮江則太逼，杭州則太遠，險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綱、宗澤惓惓以為請而不見聽從，惜哉！³⁵

作者先以觀照全局的眼光，透過地景本身的位置、其與鄰近空間的連接關係及形勢，和過去一眾帝王建都的實況，說明各個都城的地位與用途，如同具象出一幅地圖。而地圖的繪成作為一種敘事方式，其中不只傳達了事實，也涵有作者對地

³³ 湯茂林、金其銘：〈文化景觀研究的歷史和發展方向〉，《人文地理》第2期（1988年6月），頁43。

³⁴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28。

³⁵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17-1518。

景的詮釋，³⁶上文謝肇淛即旨在批評歷代對地景的使用，顯出其對歷史的反省意識，最後把視域回歸到本朝，寫：

以我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蓋山後十六州自石晉予狄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為故物矣，一旦還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北韃之勢強於西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燕雲矣。故定鼎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虜之命。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測哉！³⁷

地景背後的歷史沉積隱藏著不同時代的權力實踐，而從這一方面而言，地景作為「文本」，其書寫意義在於回歸與改變現實，³⁸謝肇淛說明了國家的成敗建立在地景的使用，而對明代帝王建都決策的認同，可見其表面是書寫地景，實則是由地景所有的文化記憶回顧過去的人文歷史，以作出肯認或批判的理性省思。

三、山水的遊觀與再現

《五雜俎》是集旅遊指南與人文式遊記於一身的筆記體文本，³⁹謝肇淛既有客觀地對遊者作出指導，亦有抒寫自身在旅遊時的特殊體驗與生命感悟。前者如其記錄了親身經歷的遊山的險絕：「余己丑夏下第，適天欲雨，暝雲四合，與徐惟和自絕頂直趨至平地，而後雨作。要其險豈能敵白鶴嶺之半乎？若登山遊眺，

³⁶ 戴伯芬指出：「地圖做為一種敘事方式，反應了製圖者隱而不顯的動機與企圖。」說明其研究外勞文化地圖、臺北市外籍勞工分布圖和認知地圖的原因，而本文取地圖並非客觀地景的呈現此一觀念，把謝肇淛對地景的全局觀察，喻為地圖的繪製，表明其對地景的敘述是帶有特定的詮釋意圖。見氏撰：〈他者的都市文化地景建構：三種外籍勞工研究取徑下的地圖分析〉，《中外文學》第33卷第9期（2005年2月），頁72。

³⁷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18。

³⁸ 法國學者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文本作為某個體系的產物和成形空間，它的意義在於回歸現實；因為要改變現實，文字遊戲才凸顯出來。它作用於它的外部世界。」見氏著；方琳琳、黃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22-223。

³⁹ 林淑慧說明兩者的分別：「遊記歸屬於散文的次文類（sub-genre），是以記遊寫景為主要內容的散文類型。通常為作者遊歷異地的主觀記敘，有明顯的敘事秩序；且作者脫離日常生活固有的生存空間，為特殊體驗的紀錄。遊記的要件為所記內容必是作者親身經歷，並以記遊為最主要目的；同時需呈現作者心靈活動，若僅是客觀解說，只能視為旅遊指南。」至於人文式遊記的意思，其言：「景觀式遊記重在景觀的敘寫和鋪陳上，用種種妙喻巧譬狀物摹景，尋幽訪勝，以求透過文字將旅遊的現場帶到讀者面前。至於人文式遊記則著重在知識的人文思考上，往往深入旅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思索人群的活動，觀察社會生活方式；或是藉景發揮，在鑑賞風物之外，引帶出人生的哲理或是時代的批判。」見氏撰：《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頁192，200。

險尚有什百於此者。」⁴⁰也有言：「余遊四方名山，無險不屆，並未失足。」⁴¹豐富的經驗使其對如何遊山有所深思，並在筆記中向讀者分享「遊者所當戒」、⁴²「遊者又多未之及」等心得。⁴³文中，謝肇淛表現出強烈的遊人意識，他注意到遊山者與山水的互動關係，道：「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贊賞，千載不絕。豈亦有幸不幸耶？」⁴⁴山水的價值體現於遊人的往來，其又寫：

故遊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旁，勿便錯過；一步未了，莫憚向前。寧緩毋速，寧困毋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生厭怠。攜友勿太多，多則意趣不同；資糧勿太慳，慳則意興中敗。勤幹見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偕酒人，勿攜孱伴。每到境界，切須領略；時置筆硯，以備遺忘。此遊山之大都也。⁴⁵

伴侶狀態、個人心境與步伐遲速，這一切的考慮都是為了遊山過程的心靈感受。山水本為客觀之物，然而遊人在領略「境界」時，其個人的主觀情思可與自然景象融合，於是「境界」不再只是觀者因感官知覺的作用而得的客觀情景，而是成為造化與心源合一的「意境」。⁴⁶作者之後提到的「時置筆硯，以備遺忘」又說明了遊者本身擔當著再現山水的角色，而此種再現是以親身探訪地景為前提，如文中記：「山莫高於峨眉，莫秀於天都，莫險於太華，莫大於終南，莫奇於金山、華不注，莫巧於武夷，其它雁行而已，峨眉之巔有積雪，武夷半壁有仙舟，華不注地中崛起，天都面面蓮花，苟不親見，以語人，未必信也。」⁴⁷謝肇淛重視自身的地景書寫的真實性。至於再現的能力，作者在論及五嶽時，有言：「以今天下之勢論之，當以天壽山為北嶽，羅浮為南嶽，鐘山為東嶽，點蒼為西嶽，衡霍為中嶽。其間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無外之觀。此非拘儒俗

⁴⁰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44。

⁴¹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44。

⁴²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47。

⁴³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49。

⁴⁴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49。

⁴⁵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49。

⁴⁶ 宗白華：「意境是造化與心源的合一。就粗淺方面說，就是客觀的自然景象和主觀的生命情調的交融滲化。」又有言：「意境是使客觀景象作我主觀情思的註腳。」見氏撰：〈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收入林同華主編：《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327-328。

⁴⁷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49-1550。

士所能與議也。」⁴⁸其以當今地理形勢為依據，改變自三代以來所定位的五嶽，⁴⁹並認為由此五嶽所形成的「至大之域」、「無外之觀」，是拘儒俗士無法形構的宏大圖景。此反映出山水的再現因遊人的文化與審美而出現差異，⁵⁰謝肇淛有以鑑賞山石為例：「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間，自與世間傳玩諸石氣色不同，蓋深山之中，受霧露、日月之精，不為耳目之娛。每至樹木茂密，煙靄凝浮，一種賞心，非富貴俗子所可與也。」⁵¹表明富人、俗士對山石的欣賞只為「耳目之娛」，不能深入感受石頭的「氣色」。

深入而言，把山水的再現具象為實境，則是與造景有關，謝肇淛說明園林中假山的生成因由：「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臥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真山真水，隨意所擇，築菟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對奇峰，或俯清流，或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絕，即善繪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疊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⁵²由於地域的局限，居於江北者難得真山真水，所以他們自製假山以創造出可以體驗遊觀之樂的空間。但事實上，南方亦興起對園林藝術的追求，於是生出弊病：「北人目未見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真山而偽為之，其蔽甚矣！」⁵³而且，假山的製造貴在表現出「天然之致」⁵⁴，作者十分反感那些只追求物質的堆砌的築園者，其言：「余每見人園池踞名山之勝，必壅蔽以亭榭，妝砌以文石，繚繞以曲房，堆疊以尖峰，甚至猥聯惡額，累累相望，徒滋勝地之不幸，貽山靈之嘔噦耳。此非江南之賈豎，必江北之闖宦也。」⁵⁵園林作為文人建構生活品味的空間，反映了「人類的意志」⁵⁶，是園林主人主觀心境情趣的投射，⁵⁷明代後期的富人都藉由興建園林以顯出自己的地位，⁵⁸羅筠筠總結當時富

⁴⁸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20。

⁴⁹ 作者有寫：「五嶽者，中國之五嶽也，隨其幅員，就其方位而封之耳。三代洛邑為天地之中，南不過楚，北不過燕，東不過齊，西不過秦，故以嵩山為中嶽，而衡、岱、恒、華，各因其地封之以為鎮山。若後世幅員既廣，方位稍殊，即更而易之，亦無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見[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20。

⁵⁰ 林宜蓉指出：「觀看／再現模式之別，乃源自於不同的文化立場、審美趣味；而不同的文化立場與審美趣味，對於『城市人文』與『山水自然』，則有著不同比例的取擇與偏重。也因為此種不同，連帶牽引出觀者透過文字或圖繪所再現出來的城市風情，異趣橫生、各如其面。」見氏撰：〈山光／粉黛共消遙？——晚明文人江南歷遊之文藝再現與敘述策略〉，《國文學報》第 47 期（2010 年 6 月），頁 206。

⁵¹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30。

⁵²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35。

⁵³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35。

⁵⁴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35。

⁵⁵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35。

⁵⁶ 吳明益：〈造心景，抑或安天命？論劉大任《園林內外》中的園林觀與書寫特質〉，《臺灣文學學報》第 15 期（2009 年 12 月），頁 218。

⁵⁷ 曹淑娟：「造園原理可以為各家園林相通，然而主人傾注於園林中的主觀心境情趣，則為各家園林所獨有，亦是園林得以超越形器層次的精意所在。」見氏撰：〈夢覺皆寓——《寓山注》的園林詮釋系統〉，《臺大中文學報》第 15 期（2001 年 12 月），頁 230。

⁵⁸ 詳見巫仁恕：〈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近代史研究所集

豪與士大夫造園的心態差異：「一些官僚地主、富商巨賈卻不顧朝廷的限制，競相疊石造園，由於一味露財顯富，故一些建築、園林盡管龐大富麗，卻不免堆砌庸俗。士大夫也以極大的興趣投入到為自己營造一處可居可遊的安樂之所的活動中，他們一般不注重其誇飾雕琢，而更強調其給人以精神上的審美享受的方面。」⁵⁹謝肇淛在文中寫：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亦近於淫矣。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為第一，據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即此數語，勝概已自壓天下矣。乃知古人創造，皆極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鬥鉅麗已也。⁶⁰

他先直言王世貞為了造園而毀損城門以搬運山石的行為乃「近於淫」，又以北宋苗帥園的內部景觀說明園林貴在造景自然，而園林內部的各種物質與建築態勢反映了自然或俗惡，⁶¹富人、俗士只著重於誇飾園中景物，作者批評：「紈綺大賈非無臺沼之樂，而不傳於世者，不足傳也。拘儒俗吏極意修飾以自娛奉，而中多可憎者，胸無丘壑也。」⁶²謝肇淛也把自己置於富人的對立面，描述自己與他們不同的治理園圃的取態：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修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況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為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費難得之物，每每山行，遇道旁石有姿態者，即覓人舁歸，錯置卉竹間，久而雜沓，亦覺有郊垌間趣。蓋不惟無財可辦，亦使他日易於敕斷，不作愛想也。⁶³

園景的築設往往涉及物質的購入與運用，富豪造園不但花費大量的物力，還在心理層面為物質所困，擔心後代無法守園，而作者則堅持以「無財可辦」的方式裝

刊》第 61 期（2008 年 9 月），頁 5。

⁵⁹ 羅筠筠：《靈與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179-180。

⁶⁰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36。

⁶¹ 巫仁恕：〈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頁 23。

⁶²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36。

⁶³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 1530。

飾小圃，把園地的美學建立在從自然環境中得來的事物上，而非治園者的富貴權力。蕭馳曾引及晚明陳繼儒（1558—1639）為費無學《園史》作序時所言：「輞川何在？蓋園不難，難於園主人。」⁶⁴以後人對唐代詩人王維所居之輞川的記憶召喚為例，點明創作者由景觀所得的美感其實只跟個人的經驗相關：「美景只是此一存有者在與整體存有界同現共流之中對意義的領會和開顯而已，嚴格說來不可重複。」⁶⁵但是遊者卻能感受到人工景觀的美感，謝肇淛曾舉一例：

吾閩窮民有以淘沙為業者，每得小石有峰巒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甃土為池，疊螭房為山，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峰森列相向，而書晦翁〈棹歌〉於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碗，山如筆架，水環其中，蜨螭為之舟，琢瓦為之橋，殊肖也。余謂仙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一賤傭，乃能匠心經營，以娛耳目若此，其胸中丘壑，不當勝紈袴子十倍耶！⁶⁶

賤傭所作的地景模型正是山水再現的實證，而其「匠心」即是重構武夷全景的能力，「胸中丘壑」又有關於其精神面向的高度。上文顯現了作者鑑賞此一模型時神思的運作進路，其必無如仙人一般在雲下觀察武夷，但卻一定曾用心遊觀武夷，於是想像出一個武夷的全景。當其看到窮民由泥土、螭和蜨螭等淘沙所得而構出的庭景時，眼前的圖像與腦中的武夷印象相互契合，由此在模型中窺得武夷的風貌。這揭示出山水的再現著重於構景者對現實地景的天然姿態的提取。

而不論是遊玩真實的山水，抑或是觀賞人工的園景，遊者在觸景之後可把感官的快感深化為感悟的獲得，⁶⁷謝肇淛便有經歷此一感受轉化的過程，其寫：

余在德平葛尚寶園見木假山一座，巖洞峰巒皆木頭疊成，不用片石抔土也。余奇而賞之，為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奈何？」答曰：「此土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賞其達。⁶⁸

⁶⁴ [明] 衛泳編評：《冰雪攜》（上冊）（上海：襟霞閣，1935年），頁2。

⁶⁵ 蕭馳：〈設景與借景：從祁彪佳寓山園的題名說起〉，《中正漢學研究》第21期（2013年6月），頁241。

⁶⁶ 蕭馳：〈設景與借景：從祁彪佳寓山園的題名說起〉，頁1536-1537。

⁶⁷ 侯酒慧：「園林是以藝術化手法縮移自然山水，布設為可居可遊的空間，其核心精神就是再現自然山水，所以自然山水對人的心性所產生的影響，基本上也是園林所具的功能之一。」見氏撰：〈先秦兩漢園林理論初探〉，《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3期（2018年3月），頁158。

⁶⁸ [明] 謝肇淛：《五雜俎》，頁1537。

上述作者由觀賞木假山而引起對園景保存的思考是明代遊園者常有的心理歷程，齊邦諦（Baldine Saint Girons）有道：「園林通常呈現出一種卓越成就的外貌，因而得以興起永恆之感。」⁶⁹美好的事物往往能引起觀者的保存欲望，而一旦察覺此種對永恆的追求難以實現，便會生出悲哀的情緒，侯迺慧深入解釋這種悲傷：

不論是感性地慨嘆，或知性地體悟，明代文人都普遍地認知到園林終會變易荒敗的事實，從而了然於園林的不足久恃。這樣的體認若僅僅停留在認知的層次，也只是消極性的事實接收，而且更多地令人產生憂傷、沮喪的情緒以及無奈的心態，這些負面情緒並非單純是對於客觀存在的園林的不捨，其中還隱藏著遊園「人」主體生命的終將無常幻化的深沉悲哀。⁷⁰

遊園者真正不捨的其實是自己的生命，謝肇淛在遊園時思及世間事物終會衰亡的事實，而藉由與葛君的對答，又自然地消解了遊園所帶來的悲哀感。他也有以古人為鑑：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概，甲於天下；司馬溫公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況以晉公之勛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慚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⁷¹

作者先把唐裴晉公湖園與司馬溫公獨樂園作對比，指出前者「甲於天下」卻「未始有餘」而後者「卑小」卻「未始不足」，後又把獨樂園與同時代的洛中諸名園並言，宋代李格非（1045-1105）《洛陽名園記》有記載湖園、獨樂園和其他洛中名園的內部景觀與其自身的遊園心得，若對比湖園和獨樂園的敘述，可見李格非在抒寫湖園時，極力讚揚園中的建築與景致，並詳細記錄遊園時的感官享受。⁷²但對於獨樂園，他則說明了園中的讀書堂、澆花亭、弄水軒、種竹軒、見山臺、

⁶⁹ [法]齊邦諦（Baldine Saint Girons）：〈園林之邊風景旁〉，《哲學與文化》第39卷第11期（2012年11月），頁34。

⁷⁰ 侯迺慧：〈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以明人文集的呈現為主〉，《政大中文學報》第4期（2005年12月），頁135。

⁷¹ [明]謝肇淛：《五雜俎》，頁1536。

⁷²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5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頁246。

釣魚菴、采藥圃等建築物的「卑小不可與他園班」⁷³，最後點出：「溫公自為之序，諸亭臺詩頗行於世，所以為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⁷⁴林素芬據此推論獨樂園：「構園的空間設計，主要仍以個人活動為準，以提供園主讀書與私人著述、避憩養生等活動之用。這就凝塑了『獨樂園』的基本性格。」⁷⁵獨樂園中各種格局細小的設施正好說明司馬溫公構園是為了達到「自適」的目的，其精神的滿足不以物質的供給為先行條件，其園只因其自身而具有價值。而宋人李格非與明人謝肇淛對獨樂園的跨代認同，說明此園因能展示園主的人格精神而得到永續的關注，這即是司馬溫公的「傳世之具」。綜言之，從謝肇淛的山水和園林論述可知，自然山水雖然也是由物質構成，但相較而言，人工築設的園景卻更能讓遊觀者產生反省人生的意識，足見山水的再現不但關係到景物呈現的差異，更影響到遊觀者在觸景後心靈的感悟方向。

四、結語

本文從兩方面探討謝肇淛《五雜俎·地部》的地景書寫，首先以「文化記憶的召喚與重塑」為觀察方向，得出作者面對舊有的文化記憶時，會透過實地的考察對之作出驗證，加上日常的生活經驗所得，形塑出新的文化記憶，並且進一步回顧該地景的歷史背景，由古鑑今，提出個人對地景的運用的評判。其次以「山水的遊觀與再現」為探討面向，得出作者認知到自然與遊人的互動關係，其重視遊觀山水時個體的精神收穫，並在論及園景的築設此一再現山水的形式時，表達了對當時富人、俗士構園行為的否定，而作為遊者，謝肇淛在觀園的過程中也有興起關於生命的消亡與物質的存有的感悟。

徵引書目

(一) 傳統文獻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 5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明·衛泳編評：《冰雪攜》，上海：襟霞閣，1935 年。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明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⁷³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頁 246。

⁷⁴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頁 246。

⁷⁵ 林素芬：〈「獨樂」與「中和」——論司馬光園林書寫中的修身意涵〉，《東吳中文學報》第 21 期（2011 年 5 月），頁 123。

明·謝肇淛撰；江中柱點校：《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二) 近人論著

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3期，2000年9月，頁1-44。

王雨翌：《晚明遊記文學研究》，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徐永明先生指導，2013年5月。

田文萍：《晚明士人旅遊活動研究——以遊記為例》，四川師範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鄧前程先生指導，2011年3月。

衣若芬：〈瀟湘八景—地方經驗·文化記憶·無何有之鄉〉，《東華人文學報》第9期，2006年7月，頁111-134。

吳明益：〈造心景，抑或安天命？論劉大任《園林內外》中的園林觀與書寫特質〉，《台灣臺灣文學學報》第15期，2009年12月，頁199-232。

吳智和：〈謝肇淛的史學〉，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

巫仁恕：〈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1期，2008年9月，頁1-59。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收入熊月之、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225-255。

車海童：《謝肇淛與《五雜俎》》，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閻崇東先生指導，2012年5月。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頁72-78。

林同華主編：《宗白華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林宜蓉：〈山光／粉黛共消遙？——晚明文人江南歷遊之文藝再現與敘述策略〉，《國文學報》第47期，2010年6月，頁197-235。

林素芬：〈「獨樂」與「中和」——論司馬光園林書寫中的修身意涵〉，《東吳中文學報》第21期，2011年5月，頁117-146。

林淑慧：《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臺北：萬卷樓，2014年。

林韻柔：〈凝視與再現：天台山記中的宗教文化記憶與行旅書寫〉，《東華漢學》第27期，2018年6月，頁125-161。

- 侯迺慧：〈先秦兩漢園林理論初探〉，《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23 期，2018 年 3 月，頁 133-201。
- 侯迺慧：〈園林圖文的超越性特質對幻化悲傷的療養——以明人文集的呈現為主〉，《政大中文學報》第 4 期，2005 年 12 月，頁 123-153。
- 范宜如：〈地景·光影·文化記憶：論王士性紀遊書寫中的江南敘述〉，《東華中文學報》第 3 期，2009 年 12 月，頁 145-169。
- 范宜如：〈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燏、徐（火勃）為考察對象〉，《國文學報》第 59 期，2016 年 6 月，頁 1-27。
- 范宜如：〈謝肇淛《五雜俎》中的物質與地域視野〉，《中正漢學研究》第 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55-186。
- 康旻杰：〈地景敘事的詮釋與建構：臺北社子島文化地景的實驗性敘事操作〉，《地理學報》第 86 期，2017 年 9 月，頁 49-69。
- 張明琛：〈晚明閩籍作家旅遊與遊記研究〉，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陳慶元先生指導，2016 年 12 月。
- 曹淑娟：〈夢覺皆寓——《寓山注》的園林詮釋系統〉，《臺大中文學報》第 15 期，2001 年 12 月，頁 193-240。
- 許凱鈞：〈《水滸傳》梁山泊文化景觀析論〉，《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8 期，2010 年 10 月，頁 77-128。
- 陳玉箴：〈1960-1980 年代台灣臺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台灣臺灣文學學報》二十五期，2014 年 12 月，頁 33-68。
- 陳磊：〈《五雜俎》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王玉德先生指導，2011 年 5 月。
- 湯茂林、金其銘：〈文化景觀研究的歷史和發展方向〉，《人文地理》1998 年第 2 期，頁 41-45。
- 劉海燕：〈謝肇淛筆記三種考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6 期，頁 95-100。
- 蔡景康：〈《五雜俎》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 年第 2 期，頁 97-102。
- 鄭娟娟：〈晚明遊記的史料價值〉，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樓毅生、鮑永軍先生指導，2007 年 5 月。
- 蕭馳：〈設景與借景：從祁彪佳寓山園的題名說起〉，《中正漢學研究》第 21 期，2013 年 6 月，頁 229-250。

衡大新：〈謝肇淛《五雜俎》中閩中風土人情書寫〉，《閩台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頁95-100。

戴伯芬：〈他者的都市文化地景建構：三種外籍勞工研究取徑下的地圖分析〉，《中外文學》第33卷第9期，2005年2月，頁53-78。

羅筠筠：《靈與趣的意境：晚明小品文美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西班牙〕樂墨（Antonio Mezcuca López）：〈宋代山水文化：一個和諧理念的成就與對立〉，《哲學與文化》第39卷第11期，2012年11月，頁115-130。](#)

[〔法〕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著；方琳琳、黃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法〕齊邦諦（Baldine Saint Girons）：〈園林之邊風景旁〉，《哲學與文化》第39卷第11期，2012年11月，頁27-40。](#)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頁18。](#)

[〔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英〕艾倫·貝克（Alan R. H. Baker）著，闕維民譯：《地理學與歷史學——跨越楚河漢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D.W. Meinig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Ge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John Leighly, ed.,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